

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第三波

——关于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通讯

乐黛云

钱林森总主编并转各位分卷主编：

《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》的编撰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千秋大业，它预示着世界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。

记得1985年8月，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上，75岁高龄的艾田伯教授发表了他最后一次在国际会议上的公开讲演，也是他退休前夕对他从事了一生，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比较文学的最后总结。这次讲演的题目就是“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”！在讲演中，他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给予很高评价并寄予厚望。他指出，中国比较文学刚刚起步，即充满生机。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没有纯理论演绎的沉重负担，而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深远传统，它正在走向世界，将以崭新的世界眼光重新评价中国辉煌的文学宝藏，从而对世界文学产生更重大的影响，并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伟大贡献。艾田伯教授以锐利的眼光洞察了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，预见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景。他的讲演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艾田伯教授的预见。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，跨越了洲际界限，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。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，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，与外国文学开始平等对话。早在1980年代末，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就共同策划了《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》共10本；2002年，在钱林森同志的主持下，又出版了《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》10卷，展示了比较文学研究水平的巨大提高和视野的扩大。今天，在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，诸位又在策

划新的《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》，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，将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新的制高点。

如果说《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》是第一波，《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》是第二波，那么，《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》则应是第三波。作为第三波，我想它的特点首先应体现在“交流”两字上。它不单是以中国文学为核心，研究其在国外的影响，也不只是以外国作家为核心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，而是要着眼于“双向阐发”，这不仅要求新的视角，也要求新的方法；特别是总的说来，中国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多集中于古代文学，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集中于现代文学。如何将两者连缀成“史”实在是一大难点，也是“交流史”能否成功的关键。

其次，由于《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》刚出版两年，有些材料难免重复，如果不能引入新的、富有创意的思想和视界，恐怕也难收开创之功。所谓“后来居上”，要在“居上”两字上下功夫。

另外，对于这样的重大工程，如果期望出版后至少能屹立五十年，那么，集思广益，使之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，恐怕就很重要。是否能改变一下过去“馒头熟了就揭锅”的操作方式，对指导思想、拟订提纲、样板章节等各个环节，都分别邀请一些专家进行讨论？当然，在座诸公都是该领域的拔尖人物，但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总好处。

我很遗憾不能亲自来参加这一历史盛会，以上意见，谨供参考。

祝会议成功！

乐黛云，2005年6月29日，北京大学朗润园